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贸易保护主义

Protectionism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Jagdish Bhagwati)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3032711

F741.2
27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贸易保护主义

Protectionism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Jagdish Bhagwati) / 著

王世华 常蕊 郑葵方 / 译



北航

C16404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F741.2
2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贸易保护主义/(美)巴格沃蒂著;王世华,常蕊,郑葵方译.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7272-9

I. ①贸… II. ①巴…②王…③常…④郑… III. ①贸易保护-研究
IV. ①F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0612 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贸易保护主义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 著

王世华 常蕊 郑葵方 译

Maoyi Baohu 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門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盜版舉報)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160mm×235mm 16开本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9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100 000

定 价 29.00 元



北航

C1640443

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是在 1987 年 10 月我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所做的“俄林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写成的。无须赘言，当时的讲座并未介绍本书中的所有内容，即使我来自“流利使用英语的国家”（fluent society）——印度，而斯达芬·伯伦斯坦·林德（Staffan Burenstam Linder）教授在向听众介绍我时，称我为“东方最快的舌头”（fastest tongue in the East）。

在写作和修改讲稿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学界众多朋友们的批评和想法使我受益良多。尽管漏掉某些人的名字会有所冒犯，如果我不感谢下列人士，必会

十分怠慢。他们是：David Baldwin, Robert Baldwin, Magnus Blomström, Richard Brecher, Barry Eichengreen, Michael Finger, Elhanan Helpman, Gene Grossman, Brian Hindley, Isaiah Frank, Charles Kindleberger, Anne Krueger, Sam Laird, Robert Lawrence, Assar Lindbeck, Mats Lundahl, Alasdair MacBean, Steve Marks, Patrick Messerlin, Helen Milner, Douglas Nelson, Sarath Rajapatirana, John Ruggie, Richard Snape, T. N. Srinivasan, Aaron Tornell 和 Tom Willett。Brian Wesol 的研究助理工作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还要很高兴地提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Douglas Irwin。他为了帮助我而从事单调乏味的研究工作，并对这项工作提供了超过同龄人的智能与投入。我对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导 言

我第一次遇到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先生是在 1958 年瑞士的布里萨戈（Brissago），在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组织的一场国际会议上。他十分英俊，气质高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远古辉煌的瑞典历史中走出的令人敬畏的人物，而那段历史也同样出了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这样的大师。即使在这群精英之中，俄林仍是非常卓尔不群。他是能够在科学和实务领域都取得杰出成就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从一名

出色的经济学家成功地转型为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担任瑞典自由党的领导二十多年，并于 1944 年至 1945 年间担任瑞典贸易部部长。到 1933 年他就已完成了著名的《区际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后来凭借此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如果有人担心卓越会产生距离，使得俄林不可接近，那么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俄林非常和蔼可亲。同样，如果有人认为，自 1938 年入选瑞典议员而离开学术界后，俄林的智力会变得迟钝，勇于探索的好奇心会停滞不前，那么他的想法显然是大错特错了。俄林在与戈特弗里德·哈伯勒 (Gottfried Haberler) 和哈里·约翰逊 (Harry Johnson) 这样的博识之士进行经济问题辩论中流露出的从容不迫令我震惊。若干年后，俄林的侄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耶兰·俄林 (Göran Ohlin) 告诉我，当电视媒体聚焦到瑞典的舞台上时，人们普遍认为俄林肯定会因其颇具魅力的外表而在政治上受益，但是他的睿智的观点却总是在妨碍他。追求事物的本质，在俄林的生命中占有核心地位，却不受追求新奇的媒体的欢迎。

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比提出一个包含着俄林先生的兴趣和智慧的当代论题，更适于用来纪念他了。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历了 25 年成功的贸易自由化，其间在关贸总协定的支持下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将关税降至历史新低。在这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又重新抬头。当今的议会、国会、磋商论坛和经济峰会痛苦地见证了为阻止保护主义情绪和立法而作的种种努力。但是当我们走进 21 世纪，有必要超越这些战斗的日常喧嚣，检视一下世界贸易安排赖以形成的潜在趋势。

利益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形成了这些潜在的趋势。我要论证的主题是：能按照利益和意识形态辨别相关的思想倾向，它们并非有利于贸易保护主义。与目前的困难揭示的情况相反，日益增长的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促使新的较大的利益和势力产生。这使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同时，随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贸易政策理论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思想，进一步壮大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力量。

然而，为了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促进历史的进步，我们必须改革和加强国家乃至国际的制度框架，以利用这些支持自由贸易的利益方更有效地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贸易制度很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与之斗争的机会。为抓住这样的机会，必须进行果断大胆、富有想象力、同时可能比较艰难的制度改革。

目 录

第 1 章 战后的贸易自由化	1
一、贸易自由化及其成果 ...	3
二、贸易自由化的例外	8
第 2 章 意识形态、利益和制度...	
.....	14
一、实 例.....	16
二、思 想.....	20
三、利 益.....	31
四、制 度.....	34
第 3 章 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	37
一、非关税壁垒的增加.....	38
二、替代效应和新贸易 保护压力.....	45

三、贸易保护的效力检验·····	46
第4章 结构变化和相互依赖·····	51
一、结构变化·····	52
二、相互依赖·····	60
三、利用出口利益产生促进贸易的动力·····	67
第5章 意识形态：实例和思想·····	73
一、实例·····	74
二、思想·····	85
三、对“制造业很重要”的困惑·····	92
第6章 制度变革·····	97
一、制度变化：更好地平衡利益关系·····	98
二、制度变化：对调整的援助·····	99
三、认识领域·····	102
四、一点提醒·····	109
 参考文献·····	 110
中英文人名对照·····	127

第 1 章 战后的贸易自由化

各种利益、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制度结构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贸易政策。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贸易自由化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复苏的历史，不但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而且有利于分析贸易政策的未来走向。

1944 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设计了一个包含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原则的制度框架。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的规则可以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否则，维持自由贸易制度在经济上将不再那么

令人信服，在政治上也会更加困难。关贸总协定（GATT）提供的规则反映了多边主义和无歧视政策。这些规则使合同各方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原理从贸易中获益。^① 该制度的“三驾马车”还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设立世界银行是为了将资源引向发展中国家，以巩固自由主义的基础（否则这一基础在市场上将影响深远，却不能获得较多的情感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世界超级强国姿态出现的美国被认为是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经济制度框架的始作俑者，但是这也不全是美国人的想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② 下面这首打油诗就表达了英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一种都市精英面对前殖民地新贵的典型的傲慢：

在华盛顿，男爵哈利法克斯
向凯恩斯阁下耳语道：
不错，他们有鼓鼓囊囊的钱袋子，
但我们有充满智慧的脑瓜子。

但显而易见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果说其主导作用在制度设计之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那么在对此制度框架的宣传和维系上则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头号大国，美国为这一新的国际经济体制提供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和物质方面的支持。“美国式和平”取代了19世纪的“英国式和平”。

为何美国在当时大力推崇自由贸易秩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① 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初计划建立的是国际贸易组织，而非关贸总协定。然而，这一最初的计划从未得到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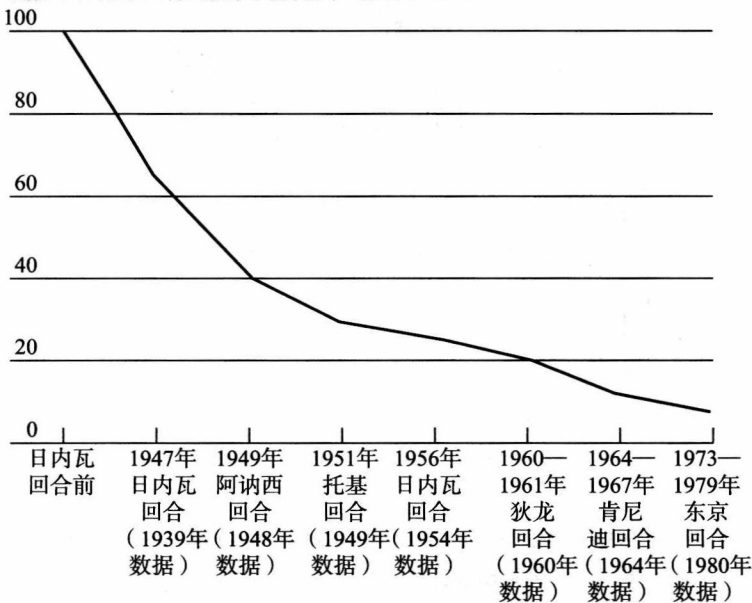
② 凯恩斯也提出了一个“商品稳定”计划，并建议建立一种叫作“COMMOD”的制度。关于这一计划的备忘录在《国际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4）上发表了。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为促进商品稳定计划作出的努力体现了对商品价格波动的关注，但这一制度最终并没有实现。在那一时期，凯恩斯以及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需要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来监管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并将其纳入整个国际制度框架。

题。这个问题与利益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在日前和将来世界经济中的发展这一中心议题直接相关。但是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自由贸易秩序的非凡成果。

一、贸易自由化及其成果

关贸总协定并没有一举清除贸易限制，而是实行了一系列的关税减让，通过七个回合（1986年9月启动，本书写作时仍在进行中的乌拉圭回合没有计算在内）的谈判展开。从1947年的日内瓦回合到东京回合的33年间，美国关税平均下降了近92%（参见图1—1）。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欧共体和日本的关税水平已分

指数（日内瓦回合贸易谈判前的平均关税=100）



关贸总协定各回合贸易谈判

图1—1 经历关贸总协定各回合贸易谈判后美国平均关税下降

注：图中的关税减让指数根据芬格（Finger，1979，表1，425页）和世界银行（1987，表8—1，136页）给出的加权平均关税率降低的百分比计算得到。在东京回合以后，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率为4.6%（世界银行，1987）。

别降至 4.9%、6.0%和 5.4%。^①

石油输出国组织 1973 年成功地实行了石油禁运，随之而来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陷入困境，在这段时期关税减让显然仍在持续进行。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长抵消了关税减让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成果。因此，伴随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贸易和收入的空前增长仅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之前是显而易见的。

1953—1963 年，世界收入以年均 4.3%的速度增长，而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 6.1%。1963—1973 年，世界收入和世界贸易的增长更加引人注目：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5.1%和 8.9%（参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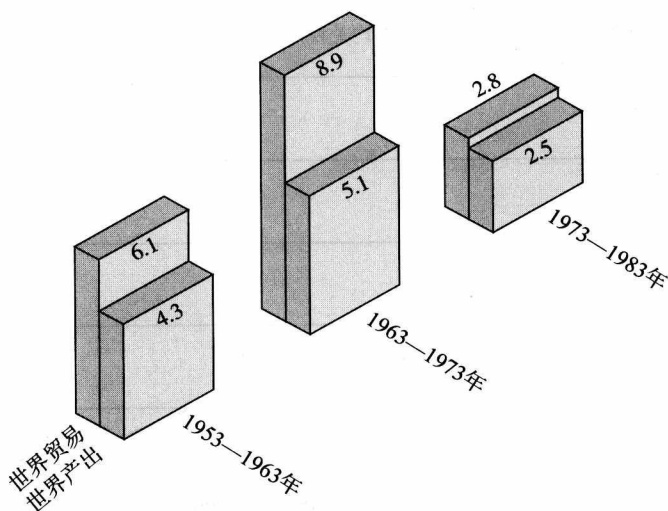


图 1—2 1953—1963 年、1963—1973 年和 1973—1983 年世界贸易和世界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

资料来源：Hufbauer and Schott, 1985, table A—1, page 97.

^① 这些是东京回合（1974—1979 年）所达成的关税减让全部实施后的估计平均关税税率。参见 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中的图 8—1。

如此优异的成绩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创造的（参见图 1—3），其
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在 1960 年为 71.0%。^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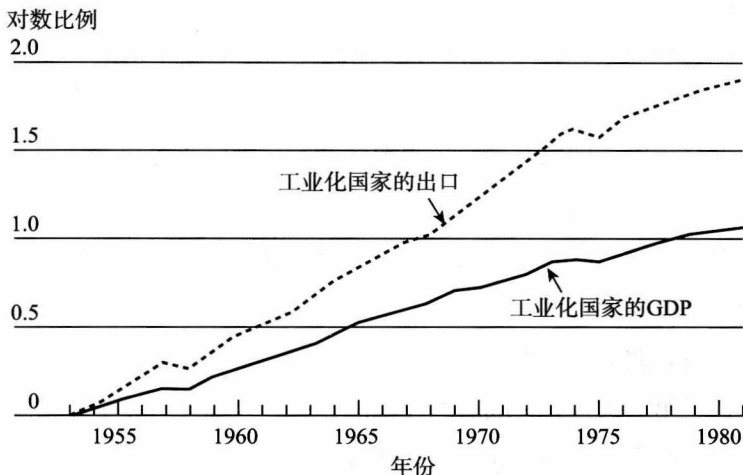


图 1—3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指数，1953—1981 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和 GDP 的增长

是贸易自由化引起贸易扩张，进而创造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经济繁荣吗？贸易的增长比收入的增长要快得多（参见图 1—2 和图 1—3）这一事实自然会引人深思。额外的增长可以由贸易壁垒的稳步减少很好地解释；实际上，若非如此，反倒令人惊讶了。但是贸易和收入增长之间的联系要比这复杂得多。到底是收入的迅速增长导致了贸易的急速扩张，还是反过来呢？正如大多数经济现象一样，我认为实际上二者之间恐怕存在一种双向的联系。

1. 从收入增长到贸易扩张

收入的增长通常会导致贸易的相应扩张，除非增长引致的供给

^① 根据国际金融统计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85, 108—109 页) 中的原始数据计算, 到 1980 年, 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 66.1%。

和相应需求模式会产生反对自由贸易的倾向 (anti-trade bias)。^① 实际上, 由于贸易扩张主要存在于工业化国家之间, 反而产生了以“支持自由贸易的倾向” (pro-trade bias) 为特征的效果。正如斯达芬·伯伦斯坦·林德于 1961 年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中所述, 相似产品 [例如, 小汽车和大汽车的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rade)] 是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仅此一点足以造成贸易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上升而非下降。因为随着收入的增长, 在大的工业品类别范围内, 人们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 而各贸易国仍专业化生产具有差异性的相似产品。

同时, 此类产业内贸易无疑减少了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成本, 因而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税减让进程。如果贸易壁垒减少时必须使一些产业萎缩, 那么可以预料将会产生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然而, 假如结果是产业内的专业化程度提高, 以致在放弃生产某些产品的同时可以增加其他产品的生产, 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将会大大减少。

事实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收入增长确实促进了产业内而非产业间的专业化发展。在一项对欧共体的重要研究中, 贝拉·巴拉萨 (Bela Balassa) (1975) 分析了 1958—1963 年和 1958—1970 年间欧共体内部贸易的扩张, 证明欧共体国家间工业制造品出口产品类型的相似性日益增加了。^②

但是, 如果说产业内贸易减少了关税减让的政治成本, 从而使关税减让畅行无阻, 并使得贸易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上升, 那么收入的增长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显而易见但仍有必要指出的是,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 经济增长能够减少经济体通过产业

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有关增长和贸易的理论文献中开始出现“反对自由贸易的倾向”这一术语。这些文献关注“美元荒”现象, 并认为其原因在于相对较快的美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变化。参见约翰逊 (Johnson, 1955)。

② 详见巴拉萨 (1975), 108—110 页。

收缩来应对贸易自由化的需要。丧失竞争力的产业只是增长速度减缓，没有出现绝对规模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和失业，这往往是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乐于见到的。如果关税减让导致贸易扩张，贸易扩张导致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关税减让，结果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造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

2. 从贸易扩张到收入增长

看起来，似乎是自由化所引致的贸易扩张通过其效率作用（efficiency effects）〔术语称之为“贸易利得”（gains from trade）〕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收入增长。现在，确实有可能在理论上构建出关于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悖论。当贸易自由化使得收入分配向储蓄率较低的群体倾斜时，如果国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不是财政政策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当前收入但可能会减少收入增长率（这不仅反映了当前的生产率，而且反映了储蓄和投资增长率）。^①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总体情况而言，我们尚没有理由相信以上悖论。

也许有人会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只是一次性的收入增长，不是持续的增长。这种观点是不足为虑的。^② 大幅度的贸易自由化能够使这种一次性的效应持续20年以上。此外，多轮贸易回合的谈判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关税减让（回想一下图1—1），也使这种对增长率的正向促进效应毫无困难地持续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增长率反映了许多因素的作用，而不仅仅

① 对于这一可能性的论述，可以参见巴格沃蒂（1968）。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帕坦尼克（Pattanaik, 1974）。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为全面的分析，参见科登（Corden, 1971）。关于此问题，芬德雷（Findlay, 1984）给出了一个优美而完整的分析模型。

②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这一论点不成立。在该模型中如果储蓄率是给定的，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永久性地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生产率的一次性提高不能永久性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参见索罗（Solow, 1956）。